

走近原始儒家

——战国楚简儒家思想研究

梁振杰 著

墨子非儒也

王充三鼓子元墨

宋玉答承安赵鼓

子思周易墨子安

荀子公羊子公羊

公羊



人

民
文
化
史
学
书
系

走近原始儒家

——战国楚简儒家思想研究

梁振杰著

戰國楚簡儒學研究

王侯三盛了无惧

父王好率教送金

人天而王喜以也

命運分善惡，遵古

责任编辑：苏向平 曹 利

封面设计：张 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原始儒家：战国楚简儒家思想研究 / 梁振杰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 - 7 - 01 - 013897 - 8

I. ①走… II. ①梁… III. ①竹简文－研究－中国－楚国（？—前 223）②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 K877.54 ②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1932 号



——战国楚简儒家思想研究

梁振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3897 - 8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序

梁振杰博士的学位论文《走近原始儒家——战国楚简儒家思想研究》将于近期出版，这是作者在博士毕业八年之后，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推出的精心之作。从选题、写作、答辩，到毕业后八年的反复修改，正好十年时间，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的成果。我看好数本著作，愿意以此序向学术界推荐。

振杰是 2004 年我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招的第一届古典文献学出土文献方向的博士生。回想起当年招生的经历，真不好说它是荒唐还是佳话，多少有点儿让人哭笑不得，就借着这篇小序，保存一段学术史上的故事吧。

我是历史文化学院的教师，既和文学无关，也不涉猎文献学领域，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做过一些居延汉简方面的研究。记不清是在 2002 年哪个月份，突然有一天王立群先生登门借书，说要看看我的《居延汉简人名编年》，我真是既诧异又惶恐，这本纯考证性的，极其枯燥、冷僻的小书，即使在历史学界的秦汉史研究领域，也很少有人关注它。而立群先生，虽说我们平时接触不多，但也知道他的大名，那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大家，虽不像后来走上央视“百家讲坛”之后那样名冠中华，但他的学术水平是公认的，我也是知道一点的。而他要看这个《居延汉简人名编年》却太出乎意料了。弄不清他是什么目的，但既已登门，拒绝是找不到理由的，我就这样带着诸多狐疑，一脸茫然地把书给了立群先生。没想到几个月后，文学院通知我去开文献学博士生的招生会议，这才知道中文系获批了古典文献学的博士点，而且似乎还和我有什么关系。到了会场，立群先生首先向我道歉，说当初借书就是为了申报博士点而组织申报材料，对我

隐瞒了这一实情。这时我才知道，立群先生把我列入了他们的博士点导师团队，让我负责出土文献方向的招生。木已成舟，米已成炊，我能说什么呢？白送你一个博士生导师头衔，再推辞什么就显得太矫情了，只好就范。

说实话，做文学院的这个博士生导师，我是很忐忑、很不安，也很不情愿的。当时的四个博士生导师，另外三个分别是大名鼎鼎的唐诗专家佟培基先生，文选学大家王立群先生，词学专家孙克强先生，他们无论是在古代文学还是在古典文献学领域，都是学有专攻的，我是跨专业过来的，就是做个配角都难以名副其实呀！立群先生拉我进他们的团队，初衷是想出奇制胜，在文献学中增加一个出土文献方向，和其他同类的申报者相比略有新意，多一点儿获批的胜算。立群先生的谋略成功了，而我却被推到了比较尴尬的位置。原来研究居延汉简，面对的是文献，其实研究的是历史，并没有从文献的角度做过，对古典文献学更是门外汉，而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不过也好，振杰则因此获受益，迈进了古典文献学出土文献方向博士研究生的门槛。

振杰入了出土文献研究的门槛，但具体的研究方向和课题该如何确定？研究出土文献，需要有古文字学的基础，有文献学的功底，我这个导师是指导不了的，而且我们还不具备直接接触出土简帛的条件，如何做？从实际出发，最后确定了与出土文献相关，却不一定严格是文献学选题，而从思想史角度进行出土文献的研究。即便如此，我以前做的居延汉简研究，也是与此毫无关联的。于是，振杰就只有单打独斗，自己去摸索选题，我的所谓指导就只能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做学问的路子这些选题内涵之外的方面去敲边鼓。所以，振杰的这篇博士论文，做得很艰难、很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就回到论文的本身吧。这篇论文的问题意识在于：“把战国楚简儒家文献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注意这一整体内各种思想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既注重其思想的一致性，更注重其思想的相互对立、相互紧张的分野与差异性，避免以往研究中孤立的‘点’的考察……在对楚简儒家思想整体关照的基础上，联系传世文献，对竹书所蕴涵的某种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力求挖掘这种思想背后的东西，考察促成这种思想形成、发

展、衍变的文化生态环境，并以此为视角更好地揭示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与文化。”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论文对原始儒家的诗学思想、治世伦理思想、心性论、天命大道思想以及音乐思想等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形态。应该说，振杰的这篇博士论文，为学界进一步认识早期儒家的思想面貌、认识中国文化创生期的思想形态和文化生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郭店楚简和上博简问世以来，简牍文献研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考证文字，补缀篇章，人言言殊，新说纷呈，一字之释即可成篇，在以篇计量、以量计绩的学术考核机制下，投向简文考释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于是，简牍研究一时之盛，赢得了诸多学者的青睐，甚至使一向视古文字研究为畏途的现代青年学人也为之倾倒。可以说，20 年来的简牍学，成了学界足够吸引眼球的一大亮点。但是，在一片繁华的表象之下，先秦思想研究却没有因为宝贵简牍文献的出土而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推进。这就是因为简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走入了歧途。我们没有把简牍研究作为澄清历史思想本来面目的途径，而是过多地为简牍而简牍，为考释而考释，而丢弃了一切都在于认识历史本身这个根本的学术宗旨。从这个角度说，振杰把研究宗旨确定在弄清早期儒家思想的本源面貌上，是有学术眼光的，其研究的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更可贵的是，通过这样的研究，振杰得到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认识，如他在“结语”中所提出的：

原始儒家的许多思想观念，与过去我们所认识的儒家传统思想存在许多不同。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家思想，是经过汉代以后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改造过的儒家思想，而非原始儒家思想。

战国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原来我们所认识的那样紧张对立，势同水火，其思想存在不少一致性和相似的地方。……这是一种文化共生现象。战国诸子学派皆源于夏、商、周三代文化，都是基于发达的农业文明和理性智慧而产生的思想学说。 .

这些不是论文的结论，而是他在研究该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启发。这些认识是很宝贵的，对纠正以往先秦学术研究中的某些偏见是有益的。第一段序

话，涉及对先秦学术的看法问题。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传承中，人们对先秦学术（当然也包括对先秦儒家）的理解，是受了汉代人的影响，甚至是被他们所规范的，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也写过题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的文章，提出这样的思想史命题。但由于资料的限制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期待有更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和大量的研究功夫去澄清，完成“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的学术论证，把它变成一个普遍性的观念和共识，甚至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振杰通过恢复原始儒家思想的研究工作，能从这个角度获得启发，是十分可喜的，甚至也可以由此选定新的研究方向。

第二段话也很有意义，过于从学派对立的角度去看待先秦学术，的确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通病，提出诸子学派之间的共性问题，是研究先秦学术的一个新角度，也是汉人擘画先秦学术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近年来，该问题逐渐得到学人的关注，可惜真正面对这个问题而深入研究者不多，它仍是一个值得下功夫去思考和研究的大问题。

“结语”中的这两点启示，并不是振杰论文所研究的问题，但他的论文却为研究这些问题打下了一个很宽厚的基础。他今后的研究会不会在这方面做文章，以博士论文为出发点，朝着恢复先秦学术本来面貌而继续努力，他没有说，但这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性选择。我们期待他把自己所获得的启发，变成更加宏富而翔实的论证，在自己选定的方向上进一步发展！

一篇小序，说这么多是可以打住了。最后我想说的是，振杰用十年功夫完成的这部著作，是有价值的，是值得一读的。贾岛的《剑客》诗说：“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振杰现在出版这部著作，就是要试试这把用十年之功所铸成的学术之剑，是否真的可以为改变人们对早期儒家的认识提供一些思想的启迪，并因此得到学界的认可。对此，我是有信心的。

是为序。

李振宏

2015年3月15日

• 目 录 •

绪 论	1
一、战国楚简文献概说	1
二、战国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现状	5
三、本书研究旨趣	32
 第一章 《孔子诗论》及其文学思想	35
第一节 《孔子诗论》的作者	35
第二节 《孔子诗论》的成书年代	48
第三节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	52
 第二章 战国楚简儒家治世伦理思想研究	113
第一节 楚简禅让思想研究	113
第二节 “忠信之道”与“恒称其君之恶” ——楚简君臣思想研究	131
第三节 修身与教化——楚简德治思想研究	152
第四节 爱亲与尊贤——楚简人伦道德与社会道德之关系	175
 第三章 战国楚简儒家文献中的心性论	186
第一节 战国楚简论性	186
第二节 战国楚简论心	200

目
录

第三节 战国楚简论情.....	213
第四节 战国楚简论心性修养.....	218
第四章 战国楚简儒家天命天道思想研究	225
第一节 战国楚简以前儒家文献中的天命天道思想.....	225
第二节 战国楚简儒家天命思想.....	234
第三节 战国楚简儒家天道思想.....	244
第四节 战国楚简儒家文献关于鬼神祭祀的论述	247
第五章 战国楚简儒家音乐思想研究.....	260
第一节 战国楚简以前传世文献中的音乐思想	260
第二节 战国楚简儒家文献中的音乐思想	264
第三节 战国楚简论乐对后世儒家音乐思想的影响	273
结 语	283
参考文献	287
后 记	295

绪 论

一、战国楚简文献概说

本书所说的战国楚简文献，是指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郭店楚简是1993年10月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楚墓里出土的。楚墓曾经被盗，劫余竹简共804枚，计13000多字。由于竹简埋藏地下两千多年，长期的水腐使其受到严重损害，其编线均已腐烂。原编连顺序也因水的浮动及盗扰破坏而散乱不清。竹简出土后，荆门市博物馆经过艰苦的编连和考释，全部书稿由裘锡圭先生审校后，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郭店楚简不同于以往出土的文书、历谱、遣策、日书、医书之类，它是由专人抄写的先秦道家和儒家文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将出土竹简整理为先秦儒道文献共13种18篇，其中，道家文献2种4篇：《老子》甲、乙、丙3篇，《太一生水》1篇；儒家文献共11种14篇：《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4篇。

弄清这批竹简的年代，是研究竹书的首要问题。出土竹简的郭店一号楚墓，位于纪山楚墓群中的郭店墓地，其南面约九千米便是东周时期楚国

绪
论

的都城纪南城。根据墓葬的型制与随葬器物的特征，考古学家认定该墓入葬的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①由此，学者们一般推断其具体的人葬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②至于墓葬中竹简的书写年代，其下限自然要早于墓葬的下葬年代。对于墓葬的主人，由于出土竹简没有记载，所以该墓的主人是谁已不得而知。李学勤根据墓葬出土的器物中有两根鸠杖，同出的漆耳杯上铭刻有“东宫之师”的字样，推断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事已高、曾经担任过楚国太子老师的贵族知识分子。^③江林昌在《郭店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史研究》一文中，认同李学勤的观点，也认为墓主可能是一位楚国知识分子。^④罗运环也认为杯文应是“东宫之师”，东宫为太子宫，东宫之师即为太子的老师，当与墓主人有关。后来周凤五也认为墓主是太子之师，不过他认为是来自邹齐思孟学派的弟子。对于漆耳杯的铭文，郭店楚墓的发掘报告认为应释为“东宫之杯”。^⑤李零认为发掘者的考释要比“东宫之师”更合理，墓主人与太子的老师或东宫之师并没有关系。关于郭店楚墓一号墓的墓主，也有学者曾经试图给出具体历史人物。如有学者提出是陈良，还有学者认为是环渊，而李裕民则认为绝非陈良或环渊，从而提出了墓主有可能是楚国太子横的老师慎到。^⑥高正《郭店竹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一文推测墓主是屈原。随后纪建生则明确表示反对，他从人物的年龄、身份、死因、屈原自沉的背景、屈原绝命的时间、屈原墓葬之有无等方面，逐一进行了反驳。^⑦周建中在《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一文中，通过对楚系墓葬的椁室葬品进行研究，认定墓主的身份为“下大夫”；通过对金文、简帛“不”和“币”二字的不

① 《荆门郭店一号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97年第7期。

② 关于墓葬的年代，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如王保铉就推断墓葬的下葬年代和竹简的抄写在秦将白起拔郢之后，约在齐襄王末年以前，即公元前278年至公元前227年之间，见《试论郭店楚简各篇的撰作时代及其背景》，载《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载《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文献》2001年第1期。

⑤ 《荆门郭店一号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97年第7期。

⑥ 李裕民：《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⑦ 高文和纪文先后发表于《光明日报》，后又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

同写法，认定漆耳杯铭文应是“东宫之杯”；屈原未曾担任过太子傅，郭店一号楚墓墓主与屈原无关。^①荆门市博物馆的龙永芳从杯底刻文的意义、楚国文字中“不”和“币”的区别，判断杯底铭文当为“东宫之杯”。又根据墓葬规格、随葬物品、竹简内容等，推断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当是楚国太子门客中的一位谋士。

从学界对郭店楚墓墓主的推断与争论中，我们看到，要想证实楚墓的墓主是谁，证据都显得单薄，难以服人；而要证伪，即证明楚墓墓主不是谁，似乎就比较简单。所以，从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要想明确指出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是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历史学的任务固然是探究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时间的单向性和历史材料的缺失，使得许多历史的真相已无法弄清。虽然如此，但有关楚墓及其所出竹简的一些基本信息还是可以确定的：楚墓下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在公元前300年，因此，所出竹书的写成自然要更早一些；墓葬所出竹书既有儒家典籍，又有道家典籍，甚至还有其他学派的典籍^②，可见这些典籍是墓主生前诵读的书籍。既然这些典籍是墓主生前所读书籍，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这些书籍在当时应该不止墓主一人阅读，而是一些已经较为流行、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可的书籍。既然这些竹书为当时知识分子所普遍阅读和认可，那么这些竹书所反映的思想，应该是流行于当时社会、为统治者所采用的思想。也就是说，竹书所反映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楚国当时比较流行的思想，至少是在知识分子中比较流行的，甚至可以说是为统治者所认可、所提倡的主流思想。所以，通过对郭店楚简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当时楚国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状况。因此，郭店楚墓竹简在楚国史、战国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就在郭店楚墓竹简发掘出土的第二年，即1994年春，在香港的文物市场上有一批竹简出现，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教授立即电传了一些从泥团上散落下来的竹简的简文摹本给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马承源先生凭着多年的文物鉴定经验，断定这是真简，于是出资收

① 《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② 《语丛》四篇的学派归属就有争议。

购。竹简送达上海博物馆后，经过碳十四测定，证明马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技术处理，确保这些竹简可以长久保存之后，上海博物馆开始了艰苦的竹简编连与考释工作。竹简共 1200 余枚（含残简），35000 余字。截至目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册，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中弓》、《彭祖》、《恒先》、《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脾》、《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竞公疚》、《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和《天子建州》（甲、乙本）、《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吴命》、《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鵩鶲》、《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籀问于夫子》及《卜书》。

这批竹简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兵家、杂家等几十部古书，其中多数为佚书，个别见于今本，但亦与传本不同。据有关专家研究，这批竹简的下葬年代与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大致相当，应在战国中期前后。考虑到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于 1993 年秋被盗，而上海简则在 1994 年初春在香港市肆出现，其年代亦在公元前 300 年前后，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把二者联系起来，推断上博简就是郭店一号楚墓被盗走而流失于香港文物市场上的那批竹简。但这只能是一个推测，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还无法将二者直接联系起来而作出肯定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这批竹简可以确定是战国时期楚国典籍，其下葬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前后，竹简的抄写和竹书的形成自然更早，这些是基本可以肯定无疑的。因而这批竹书所反映的思想，也应该在战国中期以前业已形成。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土发现，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古典文献学、思想史、学术史等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竹书可填补历史空白，纠正文献传误，对先秦时期诸多思想文化领域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战国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现状

战国楚简一经面世，立即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相关的报道和学术研讨会接踵而至。1998年5月2日，北京一些学者会聚国际儒学联合会，就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首次研讨。6月10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与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在北京炎黄艺术馆联合召开《郭店楚墓竹简》学术研讨会。10月中旬，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举办了郭店楚简座谈会。1999年元月中旬，台湾辅仁大学主办“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两岸学术研讨会”。1999年10月，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哈佛燕京学社、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共同主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会后出版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自2001年11月公布以来，上博简以其传奇的经历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备受学界关注。《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解放日报》都纷纷撰文作了报道与介绍，北京大学、《文艺研究》编辑部、清华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台湾文化联合会、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大学等，都召开了有关上博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许多出版社和学术刊物纷纷出版专集和开辟专栏，刊载有关战国楚简的研究文章，如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简帛研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清华简帛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的《古文字研究》等，纷纷刊载有关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研究文章。《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孔子研究》、《文学遗产》、《文史哲》、《中国哲学史》、《中华文史论丛》、《古籍整理研究学刊》、《齐鲁学刊》以及一些大学学报，纷纷开辟专栏，刊发相关研究文章。简帛研究网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及时刊发有关研究文章和相关信息，为楚简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快捷平台，对楚简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迄至今日，关于战国楚简儒家文献的相关研究论著已有几十部，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内容涉及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等众多领域，为众多学科领域的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竹简编连，简章组合，竹简形制；（二）文字隶定，词义考释，缺文拟补；（三）竹简思想内涵研究；（四）与传世文献及其他出土文献的对比等几个方面。

（一）编连排序，简章组合

竹简合理的编连排序、简章组合是其他研究的基础，因此关于竹简的编连排序是研究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亦是战国楚简研究的热点。楚简出版面世后，不少学者依据自己对简文内容的独特理解，及其对竹简形制、残断、佚失等情况的推测，对简文整理者的排序进行了调整，提出了自己的编排顺序。《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后，陈伟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讨论竹简的编连问题。他认为竹简编连的依据主要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所谓内在因素，主要是指词汇、句式、体裁和内容等；所谓外在因素，主要是指竹简的形态，如长度、宽度、编线的道数与间隔，书写风格如字体、密度、某些特殊用字以及标识符号等。整理竹简“只有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才能取得比较合乎原初面貌的编连结果”^①。周凤五在《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一文中，探讨了竹简的简册制度，认为文字字体与竹简形制一样是竹书研究的基础。^②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李零认为竹简的长度、形制、编线等形式因素对于排序、定篇、分类诚然有重要意义，但战国竹简的形制规律尚不确定，简牍文献的研究应照顾当时的“书写习惯”和“阅读习惯”，避免“楚书秦读”的现象。^③陈伟根据自己的编连依据，对《郭店楚墓竹简》的《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四篇简书共195枚竹简，打破原来整理者的分篇与编连而进行了重新的调整编连，

^① 陈伟：《关于郭店楚简〈六德〉诸篇编连的调整》，载《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

^② 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主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李零：《郭店楚简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主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并分别命名为《六德》、《大常》、《人虽有性》、《赏刑》、《德义》。^①随后陈伟又连续发表《郭店简书〈人虽有性〉校释》、《郭店简书〈尊德义〉校释》、《郭店竹书〈唐虞之道〉校释》等文章^②，进一步对竹简的编连提出新的调整意见。对于陈伟的重新排序，有些学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廖名春在《郭店简〈性自命出〉的编连与分合问题》一文中，通过深入探讨学界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编连与分篇的各种意见，肯定《郭店楚墓竹简》原释文的编连是正确的，简文应该是一篇完整的著作。^③在《郭店简〈成之闻之〉的编连和命名问题》一文中，廖名春不同意陈伟将《成之闻之》篇的简31至简33以及简40编入《六德》，同时又认为将《尊德义》的简1归入《成之闻之》缺乏理据，认为《郭店楚墓竹简》的原释文将《成之闻之》篇的40支简定为一篇是正确的。但廖名春对《成之闻之》又提出了自己的编连排序，并且命名为《君子之于教》。^④郭店简《成之闻之》的编连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除了陈伟、廖名春的调整排序外，郭沂也对简文进行了调整，并将自己调整后的竹书命名为《天降大常》^⑤。李零将自己调整后的竹书题为《教》^⑥，王博、李学勤也都提出了自己对《成之闻之》篇简序调整的意见。^⑦此外，李天虹的《〈性自命出〉的编连与分篇》^⑧、徐少华的《楚简与帛书〈五行〉篇章结构及其相关问题》^⑨，分别对楚简《性自命出》和《五行》的竹简编连和简章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竹简的排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当时的简册制

① 陈伟：《关于郭店楚简〈六德〉诸篇编连的调整》，载《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

② 分别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

③ 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④ 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⑤ 郭沂：《郭店楚简〈天降大常〉〈成之闻之〉篇疏证》，《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⑥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⑦ 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分篇与连缀的几点想法》，载《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学勤：《试说郭店简〈成之闻之〉两章》，载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 李天虹：《〈性自命出〉的编连与分篇》，载李天虹：《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⑨ 徐少华：《楚简与帛书〈五行〉篇章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

度、书写格式以及对竹书思想内容的理解。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研究者所作出的调整固然有自己的道理，但从整体来看，似乎很难超过竹书整理者的编连排序，因此，目前学界对郭店楚简的研究一般仍然以《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的排序和分篇为基础。

上博简面世以后，立即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在众多篇目中，排序分歧最大的当数《孔子诗论》。马承源在《孔子诗论》的《说明》中指出：“这二十九支简很多残断，有的文义不连贯，因为没有今本可资对照，简序的排列就相当困难，局部简据文义可以排列成序列，但是有的简中间有缺失或断损过多，很难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而且没有发现篇题，虽然所整理的简文内容和书法相同，但原来也未必是单独联贯的一本，句读符不统一，可能分为若干编，由于残缺严重，只能分类整理，姑名为《孔子诗论》。”^①由此可见，整理者在编连排序时基本上是“据文义”排列的。濮茅左在《〈孔子诗论〉简序解析》中，对排序方法的确立、补文依据的标准、竹简定位分类的具体依据和理由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补充性的介绍与分析。关于排序方法，他提出三个具有价值的思考点：“孔子曰”的传统主干线索、竹简特殊形式的导引标记、不可拆分的篇名组合。^②关于补文依据的标准，他说：“孔子在论述诗的过程中，循序渐进，以排比式语句出现，这一谨守其章句不乱，言重辞复而理明的特点，为我们捕捉段落、章次提供了可把握的方向，同时，也为补缺找到了匹配的文字。”“竹简上的各编线、契口间距离、墨节、墨柱、书写行款等是补文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还可参照今本的篇名、诗句及有关论说，寻求对应的文字依据。”^③关于简章组合，马承源将简文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留白简，形制区别于其他简，简文中“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讼》、《大夏》、《少夏》和《邦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是“单简上篇名纯粹是《邦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

^①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② 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同上。